



在几十年的平静生活背后,陈金玉(1926—2015)忍受了怎样的一种欺凌和痛苦。

黄一鸣2005年摄于保亭



2005年,黄一鸣采访拍摄海南“慰安妇”时的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 用黑白镜头还原黑暗岁月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黄一鸣

20年前,《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原站长、纪实摄影家黄一鸣先生,开始了有关海南“慰安妇”的主题拍摄,直到2023年11月9日,海南岛上最后一位“慰安妇”阿婆李美金在澄迈去世。最近,黄一鸣正在筹备一个“慰安妇”专题摄影展览,参加国际摄影艺术联盟主办的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摄影作品展览。

“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拍摄记录海南‘慰安妇’的?”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问黄一鸣。

“我的‘慰安妇’专题创作始于2005年,那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为《中国日报》采访拍摄了一组‘慰安妇’的专题。当年在全国公开身份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主要分布在海南、山西、湖南等地。而海南人数众多,事实也是如此,这就是我采访拍摄的主因。”

在拍摄过程中,黄一鸣做了不少功课,了解到日军在海南的慰安所数量颇多,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少的10人,一般为30多人,而规模大的有100多人,如黄流(今属乐东)日军机场军人乐园慰安所有21人,多的如红沙(今属三亚)石欧家园慰安所有52人,崖县(今属三亚)所辖的14个慰安所中共有400多名“慰安妇”;人数最多时,那大市(今儋州市那大镇)有“慰安妇”150人,感恩县八所市(今东方市八所镇)的“慰安妇”有200多人,昌江县3个慰安所有400多人。

“在日军占领的16个县和1个建制市中,仅上述4个地方就有‘慰安妇’1300多人,估计日军在占领海南期间,先后逼迫各地妇女近万人充当慰安妇,她们大部分死于非命,幸存下来到抗战胜利后的只有几十人。”黄一鸣说,“这些历尽沧桑、受尽折磨的女性,带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艰难而苦涩地生活着。2005年前后,海南省内仅剩24位‘慰安妇’幸存者。”

“除了出书和办影展,您还通过什么方式展示或分享您的这些摄影作品?”记者问黄一鸣。

“2005年,首次在国内举办了《慰安妇》专题摄影作品展览,纪念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这是全国第一个这个题材的摄影展览。2007年,由中影出版社出版了《海南“慰安妇”》摄影集;2015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原告——日军侵琼受害者报告文学图书》。在国内北京、上海、山西、丽水及芬兰国、德国等国内外举办相关展览。”黄一鸣说,“我的大量‘慰安妇’照片还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永久展示。”

2015年9月2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之际,黄一鸣还向海南省档案馆捐赠了海南“慰安妇”受害者影像资料。

黄一鸣拍摄的“慰安妇”,全都以黑白照片的效果呈现。

作家韩少功说:“他(黄一鸣)用黑白语言发掘历史,记录了日军侵华时期‘慰安妇’的悲惨命运,对暴力和强权再一次给予了无声的控诉。虽是无声,但我们可以从很多镜头中听到作者的一声叹息,听到作者全身血涌的呼啸之声。”

美籍华人、著名评论家陈建中认为:“黄一鸣的海南‘慰安妇’摄影专题所作的正是用图像和文字的结合向世人揭示那些战争受害者被忽视的痛苦。”

评论家王瑞称,黄一鸣的海南“慰安妇”纪实摄影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控诉上,在历尽万劫的战争受害者人身上,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默契的互动及情感介入,其意义超越了单向的历史事实,使一部《海南“慰安妇”》的故事成为日军侵华造成20万中国“慰安妇”惨痛命运的历史缩影。

“您在拍摄记录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记者问道。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也是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总要有人持续不断地为这些老人伸张正义,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记住这一段历史,勿忘国耻,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如今,这些老人都已经全部去世,但历史不应也不会忘记她们。”黄一鸣如是说。

## 为历史留证 用镜头正名

用影像记录“慰安妇”幸存者,陈厚志

上千张照片,数百份影像和录音素材,印证着日军罪恶暴行的血泪史……63岁的陈厚志时常对着电脑,梳理核实这些影像的时间、史实,守住历史足迹。

这是陈厚志无偿坚持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记录工作的第29个年头。如今,尽管两鬓已斑白,视力也严重衰退,他仍然用心做着整理工作。“这些是历史的证据,历史必须要得到最后的正名。”陈厚志说。

陈厚志参与海南“慰安妇”调查,缘于已病逝的“领路人”张应勇。作为《保亭文史》的写作者之一,张应勇通过幸存“慰安妇”口述整理的多篇文章受到很多关注,他渴望着能找到一名伙伴,通过影像的形式一同调查取证,记录历史。

彼时,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茂农场海南省野生动物养殖实验场当饲养员的陈厚志,是一名激情满怀的文艺青年。1996年,一次机缘巧合,二人因摄影结识,一拍即合,57岁的张应勇负责文字整理,34岁的陈厚志则帮忙拍照和做些翻译工作,精通黎族赛方言的他正好解决了这个方言区的沟通难题。就这样,他们协作配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取证之路。

在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大多是黎族或苗族妇女,在花季年龄遭遇了侵琼日军最为残暴、丑陋的伤害。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饱经折磨的老人仍背负着“日本娘”的污名,屈辱地活着。

“当时,老人们年事已高,但她们是这段隐秘历史的见证者、受害者,虽然调查取证工作十分艰难,但不做这些调查,以后无法提供证据。”陈厚志决心踏上这条路,既为历史正名,也为洗净污名。

根据这些年的调查,陈厚志发现仅在保亭加茂一带,至少有55人被日军强迫当过“慰安妇”,其中25人在调查时还健在,但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当年遭遇的寥寥无几。要让她们对一个陌生人讲出心里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对于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是一次身心难以承受的煎熬。

这些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为了让老人们敞开心扉,陈厚志和志愿者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军的兽行。

这些年,陈厚志背着相机奔走于村寨,往返调查情况,摩托车都报废了3辆。陈厚志并不富裕,但尽自己所能帮助贫困的“慰安妇”,联系援助解决她们的生活困难。“如果不是比亲人还要亲,老人是不会开口言说的。”陈厚志说。

2001年,作为幸存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者代表,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海南籍8名黎族、苗族阿婆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陈厚志提供的资料成为呈堂证供,他还陪同阿婆们赴日诉讼。但遗憾的是,多年的调查取证和法庭对质,未能换来一个公正的判决。

2003年,陈厚志被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授予特约调查员证书;2013年,他被评为“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从一名青年到如今过六旬,这些年来,陈厚送走了一名又一名“慰安妇”。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多年来记录的影像资料举办展览,用守住的历史足迹发声,穿越时光的阴霾,为那段历史中的受害者,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公正。■



2008年,日本法庭宣判败诉后,律师团向陈金玉(右二)进行说明,陪同翻译者为陈厚志(左二)。

受访者供图



2008年,陈金玉等8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的照片悬挂在说明会现场。陈厚志 摄